

文章於 2015 年 5 月 15 日刊登於信報

解年輕人難以向上流動的迷思

縱使香港近幾年失業率低與經濟財政狀況平穩，年輕人近 10 年面對一連串的自身困難，包括教育、就業、置業、創業和向上流動等，怨氣似有增無減。

此外，加上對一連串社會現象，如樓價高企、貧富懸殊、政治紛爭、陸港矛盾、資源與政經權力分配不公等的加劇，這些矛盾和怨氣在 2014 年秋政改佔領事件中激化突顯出來。

特區政府於佔領事件後亦承認青年政策與向上流動出現問題，須要重新檢討和回應年輕人的訴求，2015 年的《施政報告》更提出多項短期支援措施作回應，包括設立「青年發展基金」協助年輕人創業。不過，不少人認為港府對現今青年議題的理解過時，甚至錯判年輕人的想法，未斷症就落藥，未完全了解他們所需；單靠甜頭也未能滿足年輕人的期望或改變未來主人翁的心態，無助化解社會矛盾。他們相信，現今年輕人不但要求更多流動機會改善生活，更關心民主、公義和公平等一些非物質核心價值的追求。

向下流沒有增加

無論政改結果為何，我們不能只追求政治理想而放下其他當前政策制度與個人自身的追求。根據中大亞太研究所 2014 年底的調查，最多年輕人期望《施政報告》會優先處理房屋規劃（45%），然後依次是政治及管治（24%）、民生及福利（13.2%）、經濟發展（5.4%）。

那雖非問題的全部，但年輕人流動仍是大眾較為關心的問題。近年，很多人認為年輕人的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即在社會經濟地位或職業階層上的轉變）減慢了；相反，也有一些創業家相信現今年輕人擁有的機會仍比三四十年前為大。這些爭論只反映片面或表面徵狀，未能指出整體實際流動水平、改變和因由。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有系統地分析，以提升年輕人流動和減少流動不足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香港屬於高平均個人年收入（25000 美元）而又高度貧富懸殊的社會（2014 年的堅尼系數已達 0.537），官方數據更顯示兩極擴大的趨勢。中高層就業人士 10

年來的收入流動變化減少，近 5 年的情況更差。以收入分布及相對貧窮人口比例來看，一些近期統計分析，反映向上流動的機會或能力沒有明顯改善。但收入差距與社會流動不一定是直線關係。

2014 年底立法會研究報告指出，經理及行政人員級職位 20 年間增長不足 5%，由 1991 年 13% 升至 2011 年 18%；同期輔助級經理人員比例不斷上升，年輕人更集中擔任該類職位。至於年輕人從事工資較低的服務與銷售工作不斷上升，由 1991 年的 21% 增至 2011 年的 34%。

根據香港科大吳曉剛幾年前發表的研究，相對「第四代」（1976 至 1990 年間出生）受訪者目前的職位與 14 歲時其父親的職位比較，整體向上流佔六成七、停滯佔不足一成、向下流佔兩成四。結果證實，隔代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大多為向上流。相對「第四代」受訪者目前的職位與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研究發現整體向上流佔兩成八、停滯佔五成，而向下流佔兩成二。

在停滯方面，「第四代」佔 4 個年代的六成三，向上流（兩成一）與向下流（一成五）均比其他世代為低。由此證明，香港「第四代」呈現同代流動（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停滯不升的明顯趨勢，但向下流（包括同代及隔代）卻沒有增加，年輕人流動情況並不像很多人所說的那麼差。吳的迴歸分析結果也發現，教育程度較高、家境較富裕與成為中產階層有顯著正相關，證明個人出身確實能影響其向上流動機會，並非真的人人平等。

客觀定量的社會流動數據與個人主觀感受可能不一樣，主觀感受調查可了解年輕人認為向上流動的機會有多少困難。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於 2011 年中的研究發現，五成二受訪者認為目前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並不足夠，六成五人認為流動機會比起 14 年前差了。

未有埋怨社會

筆者在 2010 年年底參與專資會的意見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只有約半成「第四代」受訪者在過去 5 年覺得自己有向上流動、七成半認為停滯、約有兩成感到經歷向下社會流動。再次證實向下社會流動沒有成為普遍現象。

「其他世代」受訪者比「第四代」受訪者對社會流動機會的看法較正面。這些主觀感覺結果與上述的客觀數據有差異，前者發現「第四代」流動停滯的比例比後者高出約兩成半，但向下流比例卻相若。四分三年輕人感到流動停滯，因而引起了負面情緒是可以明白的。

「第四代」受訪者認為，自己未能向上流動的原因依次為「學歷低」（52%）、「香港經濟唔好」（39%）、「政府政策失誤」（33%）、「我唔夠努力」（33%）、「缺乏相關經驗」（26%）、「家庭背景唔好」（17%）、「上層職位唔多」（17%）、「運氣唔好」（14%）、「人事關係唔好」（14%）、「缺乏社會網絡」（13%）、「高層退休無期」（2%）等。

約三分二的「第四代」受訪者同意讀大學或持續進修，可以提高向上流動機會，逾四分三也同意「個人努力和其他後天因素比家庭背景更重要」。這個對家庭背景影響的主觀理解，顯然與上述的客觀數據迴歸分析結果有差異。

調查顯示，大多「第四代」較少歸咎於機會不足或不公，反而認為自己未夠學歷、努力或經驗；約三分二受訪者仍認為香港是公平公正的地方、就業市場開放、社會充滿機遇。雖然大部分年輕人對向上流動的機會不表樂觀，但仍然積極面對，願意持續進修以提高學歷，保持「每人皆有機會向上爬」的主觀感，這與傳媒的一般報道只強調政府政策失誤與年輕人抱怨上位機會減少，明顯不同；亦證明香港大多年輕人並非想像中那麼負面，只顧埋怨客觀環境，他們仍然相信個人努力與表現會改變命運。

流動停滯的部分因由，是由於一些世界大趨勢而不可避免（如環球一體化、網絡化、經濟結構轉型、財富分配不均、高等教育普及化、M形社會出現）。有部分是周期性經濟因素，自九七後，本地經濟增長一直放緩，僅為1978至1996年間的一半。經濟繁榮為人們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同時也促進社會流動；相反，當經濟成熟與增長放緩時，競爭自然較大，令向上流機會減少。過去6年，香港受到環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短期的經濟上落可能是導致過半停滯及兩成向下流的主因之一，而低技術工人更是首當其衝。

過去政府一直增加入讀大專人數的比例，從 1996 年的 18.5% 上升至近年的 40%。教育對提升個人競爭力與流動仍有一定幫助，學士學位是很多職位的入場券，其後成就很依賴個人的修為與表現。較高學歷也有助減少向下流動的風險，但增加學士學額等於增加畢業後的職位競爭，擁有大學學位不一定很快便能找到適合或好職位，特別是當經濟增長放緩時。換句話說，社會流動機會供應本身並非單方面由勞動質素或供應所決定。當然，念大學不是單單為了找工作和入息，而是為個人未來一生過着有意義快樂生活作準備。

在年輕人流動的問題上，也有個人因素，包括年輕人自身的不足（如欠缺獨立、溝通、自學、解難、創新、人際關係、團隊合作、全球視野、國家認識、抗逆及自信等核心能力），或理想過大，不夠實際；更有部分原因是很多家庭的縱容與學校教育的落後偏差，未能令年輕人裝備應有的態度與核心能力。上一代人對下一代人的特質表現應負上一定的責任。

再者，在全球化趨勢下，新一代年輕人不僅面對本地競爭對手，更面臨全球競爭對手。提高競爭力與自信，不但可提高個人專業知識，更要重的是視「深層學習」和培養個人為二十一世紀可轉移核心能力。學校及青年組織應致力協助年輕人進一步自我裝備。

在促進社會向上流動，我們須要多聆聽和了解年輕人的擔憂，也要有公共政策措施、家庭及院校教育改革作對應。在公共政策與制度方面，不少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如經濟單一化、欠缺土地發展令樓價飆升）而需較長期方案來解決，但也有部分是與現屆政府的政策表現和官民溝通信任有關；當然也有部分是政治因素，非本港社會可單獨短期內自行解決。公共政策可以紓緩，但很難短期內改變流動停滯的環球趨勢。

機遇仍比以前多

筆者認為，不可單要年輕人講求「獅子山精神」，政府有責任在各政策範疇上加強支援，包括改善教育機會與質素、協助就業創業、增加交流、培訓與實習機會。但政府最重要的責任，在於提供有利社會經濟平穩發展的條件，從而給年輕人一個得以靠自身努力來向上游的公平大環境。

一些政策與制度的失誤造成不同階層的教育機會不一樣，例如政府對進修夜中學及大部分自資學士課程的人不給予資助，對有意進修者設置障礙。我們的着眼點應是在於平等的教育機會。

雖有不少挑戰，新一代年輕人有的機遇，仍比以前的人更多。時下年輕人不論在教育水平、知識面、視野和體魄方面都比上一代優勝，年輕人應抓緊機會，應改變自己的態度和相信自己。正如馬雲所說：「若能改變自己，世界就會改變。」

這一代的客觀環境確實有很大變化，所以制訂青年政策時，不能強把上一代的經驗或價值觀加諸於新一代身上，也絕不能說「一代不如一代」。現今不少基層憑着努力和拚搏精神取得驕人成就，繼續寫出一個又一個典型的成功故事。換句話說，機會是留給已準備好的人，凡事只懂怪罪政府或制度，或要求政府樣樣出手干預，並不可以真正解決問題，反而會令社會真的「向下流」。

只有年輕人成長，香港才可以成長。